

我们相聚在这里,相聚在横跨欧亚大陆,荟萃欧、亚、非三大洲文化,且曾作为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西端终点的国际都市伊斯坦布尔,本身就是有关“跨文化与诗歌”的一个活生生的阐释。

而我,一个中国诗人,或一个为诗工作的人,能有幸在这里向一直心仪的土耳其现代诗的奠基者纳齐姆·希克梅特(Nazim Hikmet),向杰出的小说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献上我由衷的敬意,则可以视为这一阐释的一个小小脚注。

然而,无论是怎样的阐释,无论有多少个脚注,都只会支持“跨文化与诗歌”继续成为一个目标,而不是种种由成见累积而成的结论。因为所谓“跨文化”不仅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历史语境,还是一种视野和胸襟,是热爱和彼此热爱,理解和彼此理解;不仅是一种视野和胸襟,还是一种自我和他人彼此生成的镜像,或在二者之间流转不定,不断进行新的综合的能量。它首先要求具备的是实践和创造的品格。日益加速度的全球化进程早已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还将继续表明这一点。

这里所说的“全球化”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全球化,那是与以经济利益为支点、谋求份额和霸权为核心的市场全球化相平行、相相应、相抗衡的另一种全球化,是自伟大的歌德于近两个世纪前提出“世界文学”这一划时代的概念以来日见清晰的共同揭示、解读人类生存与心灵处境的全球化,是有关个体生命的激情、梦想、良知、智慧,有关语言边界的追问和探索,以及与此相关的传播、交流和沟通方式的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进程孕育、催生了中国的“新诗”即现代诗,并深刻影响了其近一百年来 的发展;也正是因为置身同一的历史进程之中,我们才会在这里相聚。

跨文化的努力不但不可能掩盖,相反会突出我们各自的主体差异性;同样,它不但不会钝化,相反会激励我们直面各自不同的“问题情境”并探索解决之道。沉默而又活跃在所有这些背后的,是我们各自依据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它曾经的辉煌,它的困境,它寻求自身变革的内在要求,当上世纪初

## 跨文化和诗歌:不断获取“神奇的动力”

□唐晓渡

叶埃兹拉·庞德和他的友人们受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俳句的启发,在伦敦开创“意象派诗歌”并使意象主义席卷欧美,成为第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诗歌运动时,中国现代诗的先驱们却在借鉴“意象派六原则”提出自己的诗歌主张,厉行“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来装进外国诗的诗意”的实验;当庞德依据东方学者弗诺罗萨(Fenollosa)的遗稿,如T.S.艾略特所说,为西方“发明中国诗”,并惊叹汉字天生就是用来写诗的文字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猛将们却将其“罗曼斯精神”推向极端,力主废除汉字,改用拉丁文拼写。这种貌似错位,以至荒诞的现象曾一再被视为中国新诗人数典忘祖的证据,然而从寻求各自传统变革的角度看,却正是“跨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激进的思潮理当清理,无效的主张可以废弃,但这“应有之义”却始终不可或缺。它不仅意味着尊重从一开始就包含了错误在内的生长的逻辑,还意味着不断获取某种“神奇的动力”。

“神奇的动力”一语出自大家手头那首中国诗人的诗,事实上它正是这主题为《嬗变——致保罗·瓦雷里》的诗所致力揭示的秘密源泉。反复出现的省略号表明,诗人的笔似乎总也跟不上他内心奔突的思绪。“每一种生命和物质……影像和镜子……”“知识……责任……权力……意志”——除了不断在语言上腾身飞跃,他又怎么能抓住那同时蕴涵了这一切的力量在极度宁静中兀然显形的瞬间?令人惊奇的是,如此巨大的能量,如此紧张的嬗变过程,在第二节中却被汇聚于一群“蠕虫”:

当神奇的动力运转起来,向前推进着的时候,一千个萌芽,齐声歌唱着它们的每一份命运。

蠕虫,娇小的蠕虫,从它们隐藏的洞穴里酣眠的胚芽里破茧而出……啊,蠕虫……激情的力量!

你们吞噬着林木和它们正在变红的肌肤。你们吃着,你们蜕变着。你们侵蚀着理性!我很高兴能在这里谈及作者盛成。由于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遮蔽,即使是在座的同胞,恐怕大多也未必知道这位集诗人、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奇性有太多的话可说,譬如11岁即以出家人身份秘密加入同盟会,次年参加辛亥革命光复南京的战斗,受到孙中山的召见;譬如20岁就作为铁路工人代表投身“五四”运动,与周恩来等结为亲密战友;譬如赴欧勤工俭学期间既狂热卷入达达主义运动,成为其惟一的东方要员,又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并任法共南方地区兰盖道克省(Langnedoc)省委书记……然而,我今天之所以谈到他并非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作为中国自有新文学以来真正以作品名动世界的第一人,同时也是跨文化写作和交流的绝佳典范,是因为他终其一生都与他笔下那“神奇的力量”相伴相生,从未失其自由和创造的灵感。而我之所以感到高兴,是因为82年前,即1930年,他曾作为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马尔(Mustafa Kemal)特别邀请的客人到访过土耳其。当时他们会面的地点是新都安卡拉,但客人取陆路来自法国,肯定途经了伊斯坦布尔。我愿意想象,此刻他也是我们中的一员。

那次盛成受邀的缘由不是诗歌,而是两年前他那部一经出版即轰动欧洲文坛,被称为“一时盛事”的长篇小说《我的母亲》。此外,同为“革命者”

大概也是一种深层的精神维系。然而对盛成来说,小说和诗歌,诗歌与革命,其间的分别远不如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万物为一”“天下殊途而同归”的存在原理,那是真正的大诗,原型之诗。事实上,盛成确实是把《我的母亲》作为一首“大诗”来写的,其自我期待是“要有《神曲》底精神,要有《第九交响曲》的音调”,应当成为“饿肚子底朋友,痛苦者的知音”,它将是一首“人曲”;而在纪德、罗曼·罗兰、萧伯纳、海明威等他的朋友们看来,这部作品的精髓也在于“通篇闪耀着诗歌精神的光亮”。不必说,那在《嬗变》一诗中透入“阴翳的深渊”,使“沉默的、孤独的结绀,/在忧郁的心灵的阴影中,哭泣着延伸出枝节,/在高处飞翔,凝视着情感之树”的,当是同一种光亮。一个心中怀有这种光亮的人,一个能听到“一千个萌芽,齐声歌唱着它们的每一份命运”的人,人生逢其时而将革命者和诗人一起认取,不是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自然而然吗?

把《嬗变》一诗献给保罗·瓦雷里隐含着另一段“跨文化”的佳话。人们尚不清楚,同为1927年,盛成写作这首诗与他在巴黎大学开讲中国“群经之首”《易经》而令作为听众的瓦雷里喜出望外,在具体时间上不知孰先孰后,但可以肯定,一年后《我的母亲》出版,历来以惜墨如金著称的瓦雷里亲撰万言长序,决非是个人之间的投桃报李。在这篇序文中,瓦雷里一方面盛赞作者“以一种最别出心裁、最细致入微和最巧妙的手法写就此书”,“揭示和彰显出一个时代诞生中的沧桑巨变”,一方面痛斥了其时西方世界对中华民族及中国历史文化根深蒂固的无知和偏见。他写道:“如果作者对我们相当了解,那么他是否借用他母亲的人与名,来

触及到我们的灵魂呢?他从没有想到通过母亲的慈爱,委婉地使其转变为我们对博爱的笃信吗?我几乎不可能想象一个西方人,能够用最高尚的情感,毫无顾忌地对中国人倾诉衷肠。”

如此广博的理解和同情,如此深挚的自省和自察。我不知道就跨文化交流所可达成的效果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反响更能荡涤我们的灵魂,更能从内部解放我们的创造力!

一个本应言简意赅的发言,却装着一个或许已经过于冗长的故事,为此我必须向大家致歉。作为某种自我心理补偿,我相信没有人会把这故事仅仅当成一个故事,而忽视它同时还是一种启示。所有的故事都趋向结束,而启示,则带来不断的开始和延续。当然,历史的场景、语境的上下文、主人公的身份和角色,可以诉诸的方式和手段,诸如此类都不妨变也必然会变;但诗人关注人类命运及其心灵境遇的必然性,诗歌不断突破既有边界,探究生命和语言的新的可能性的职能,由此生发出的跨文化写作与交流的强烈欲求和企及目标,却没有变也永远不会变。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中,在不同情节的急速转换和同一主题的反复重申中,我们共同见证、传播着自由的诗歌精神薪火,并经由碰撞中影响的相互渗透,越来越成为彼此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请允许我回到已被搁置了太久的“蠕虫”。必须承认,当我前面说这一象喻“令人惊奇”时,其原本的喻指在我心目中早就发生了转移。我的意思是:对洞悉人类苦难、通晓中国古典,而当时又仍充满社会革命余绪的盛成来说,选择这一“齐物我”的喻象可谓其来有自,并不足以令我惊奇;真正令我惊奇的是,这一喻象似乎更适合用来象征今天诗和诗人的处境,更适合用来隐喻当代跨文化写作和交流所暗中含生的嬗变过程。我不认为这种误读有太多的悲观或自嘲的意味。毕竟,盛成笔下的蠕虫不是卡夫卡笔下的甲虫,正像它们隐身的洞穴不是甲虫背上的硬壳一样。现在,我甚至更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从内部鼓舞着它们的“神奇的动力”。

新世纪,随着新媒体异军突起,文学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跟重新洗牌的文学现场相比,真正能够领风骚的批评缺席,至少是滞后的。它仍像是一头代表着旧文明的老牛,被不断提速的文学火车远远甩到夕阳中。四处寻找新出路的创作,对批评的失语或脱节颇有怨言。我不想重复新老作家们的牢骚,与其气愤地批评批评不该是这样的,不如畅想一番:批评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即使是一头牛,也该是好斗的公牛,看见谁跑得比自己快就眼红得想追的那种,哪怕追的是一趟火车。换个诗意的说法:批评就该有一种夸父逐日的精神。哪怕累死在穷追不舍的路上,都是光荣的。可我们当下的批评呢,仍然不温不火地闲庭漫步。

连文学的翻译都被形容为一种再创作,文学的批评更应如此。我理想中的批评,应当把这种再创造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它不是创作的尾巴或附属,而是创作有效的延伸,是作者的激情与梦幻在批评家手中的接力,是作品的灵魂在他者的视野里继续生长。如果说好的作品应当经得起无穷的阐释,好的批评应当向那无限的可能性勇敢挺进,并至少使其中的某一种得以实现。

我理想中的批评,重在发掘原作的潜能,假如毫无新的发现,那真正属于“多余的话”了,有何存在的价值?何必画蛇添足?批评家如果不是发明家,但起码应该是发现者。替更多的读者揭示原作中不是一眼就能望穿的风景,乃至风景的内核。他的勘探,甚至超过作者的预期与储备,使作品的指

## 我理想中的批评

□洪 烛

向获得新的可能,新的空间。

我同样呼唤能出现挑战者式的批评家。勇于站在创作者的对立面,总是能找到对手的软肋,一针见血地点到穴位。他同样也是发现者,又高于一般的发现者,因为他还发现了作品的不足之处,并且说出来,给创作领域敲响警钟。他就像像牛虻一样,刺激得作家们向更高的境界一路狂征,在创作活动中再也不敢偷懒。如果失去了天敌与危机感,创作的动物必然放慢脚步,甚至可能退化。最严肃的批评家,就该是完美主义者,不断地给创作者制造难度,提升难度。如果文学变成无难度的写作,不仅是作家的惰性或急功近利使然,同时意味着批评家的失职,意味着批评对创作的监督作用大打折扣。勇敢的批评有助于造就勇敢的文人,因此,我呼唤有难度的批评,尤其是对无难度的写作乃至伪文学宣战的批评。

真正的文学必然有痛有痒,批评要够得着文学的痛处与痒处。批评应该是入木三分的强刺激,而不是无关痛痒的象征性抚摸,那只能增加文学的麻木。难道,还觉得今天的文学麻木得不够吗?

我理想中的批评,对僵死的文学有重新启动乃至再造的功能。前提是:它必须学会说不。对伪文学说不,对腐

评与创作形成互动,才是有意义的。网络现场,是在呼唤自由的批评,是在恢复批评的自由。文学的宗旨是“说真话”,批评也应杜绝说假话,说套话,说空话。

我理想中的批评,不是构成创作的平行线,而是有交会、有交锋,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甚至能扭转或引领创作的趋向。创作与批评的角力,其实又形成一合股力,使文学就像一棵雌雄同体的古老乔木,在自觉与自觉中向更高处生长,追求着自我超越,而不是自我重复。批评不是文学的外力,而应是文学自身具备的内功。

我理想中的批评,是旗帜鲜明的,不是态度暧昧的。是横刀立马叫阵与对阵的,不是敲着边鼓助阵的。批评家与作家应该是棋逢对手,兵对兵将将对将的,而不是坐在观众席上的亲友团,更不是帮助营销的托儿。批评家的人格是独立的,批评才是有骨头的。

恐怕是为营造了或破坏文学的“和谐”,当今占主流的是“鸽派”的批评。这没错。但如果批评界“鹰派”缺席,文学的天空将是单调的。记得以前有诗人说过:对于创作,团结是一种力量,不团结也是一种力量。是的,独创比合唱更能体现文学的生命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最真实最有包容性的大合唱,才是最高意义上的和谐。批评跟创作一样,需要发出个性化的声音。杜绝了假嗓子,有血有肉有骨头的批评家,才能以有爱有恨有体温的批评,赢得作家与读者的双重尊敬。

作家的批评观

## 高擎民族精神的火炬

□杨 娟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趋势,如何高擎文学这一民族精神的火炬,更好地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成为文艺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一大课题。刘文斌新出版的论文集《文学民族精神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1年12月),对此作了较好的回答。

列于该书篇首的《文学民族精神论》,系中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文学课题组的子课题。作者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科学阐明文学与民族精神的辩证关系:“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民族精神因文学而得以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是文学的灵魂,文学因表现民族精神而得以辉煌。”文章号召作家以先进文化引领文学创作,“在充分发挥文学对民族精神火炬作用的同时,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该文还结合中外文学史上大量现象,就文学为何应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和文学如何才能成为民族精神火炬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阐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是进步文学的本质特征,是中外文学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神圣使命,阐明反映和表现民族精神既是提升文学作品质量的重要保证,也是扩大文学作品社会影响的有效途径,作者希望作家要以唯物史观烛照自己创作的方向,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撷取民族精神的火种,要从中外文学遗产中借鉴文学弘扬民族精神的经验。文章论点新颖,论证充分,堪称同类内容文章中的翘楚之作。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纯

审美”“纯艺术”的声浪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其中固然不乏试图纠正“文革”中“文艺为政治服务”偏向的善良动机等,但也确有人是以以来反对文艺为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反对文艺要“高擎民族精神的火炬,吹响人民奋进的号角”的正确主张。该著中《关于文艺的审美理想》和《论邓小平的文艺审美理想观》两文,正是针对这种现象而写的补偏救弊之作。前者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等的有关论述,阐明马克思主义文艺审美理想观,指出文艺审美理想既是美学的,又是社会的,是通过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表现出来的富有审美特征的社会理想;后者认为邓小平立足新时期文艺现实,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审美理想观,提出文艺审美理想是反映现实与表现理想的统一,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与百花齐放的统一等正确主张。该著还针对新时期某些人士在“纯审美”论、“纯艺术”论幌子下,竭力贬低以鲁迅、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革命文学,无限拔高汉奸文人、反动文人和对革命持消极态度的文人的做法,揭穿“纯艺术”论、“纯审美”论的荒谬性和虚伪性,为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前进扫清了思想障碍。

该著还收入作者评论当代作家作品的文章,作者褒扬有助于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作品,对那些饱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文学垃圾、精神鸦片,则痛下针砭,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

（上接第2版）																
33	《遭遇北盘江》	魏荣钊	土家族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年10月	马明仁、金贝伦	贵州作协	纳西族	昆仑出版社	2008年8月	侯健飞	昆仑出版社				
34	《远山的歌谣》	安元奎	土家族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年9月	姜丽	贵州作协	马泰泉	回族	作家出版社	2011年4月	姜琳	总政宣传部艺术局			
35	《湘西叙事》	聂元松	土家族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年1月	李大春、李进	湖南作协									
36	《红尘往事》	王小忠	藏族	阳光出版社	2011年12月	戎爱军、王佐红	甘肃作协	爱新觉罗·蔚然	满族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8月	陈军、盛亮	复旦大学出版社			
37	《我的家园》	玛尔尕	裕固族	民族出版社	2008年11月	尹俊	甘肃作协	卜谷	满族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1年7月	俞杰	江西作协			
38	《触摸紫色的草穗》	完玛央金	藏族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8年12月	马映峰	甘肃作协	刘国强	满族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艾明秋、董喆	辽宁作协			
39	《我想倾听你的心声》	古力巴哈尔·艾则孜	维吾尔族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凯丽比努尔·米吉提	新疆作协	陈边嘉措	藏族	重庆出版社	2008年9月	陈建军、刘玉浦	重庆出版社			
40	《神树的约定》	布饶依露	佤族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年12月	柴伟	云南民委	张弘	回族	上海三联书店	2011年9月	叶庆	天津作协			
41	《寻找侗族大歌》	杨曦	侗族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年5月	张良君	贵州人民出版社	陈晓兰	蒙古族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1年12月	王媛媛	宁夏作协			
42	《夜之华：阿莫小语》	阿莫	满族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9年6月	河流	中国言实出版社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43	《天使降临的夏天》	苏莉	达斡尔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0年5月	高彬	内蒙古作协									
44	《父亲与故乡》	纳·乌力吉巴图	蒙古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1年11月	哈丽亚	内蒙古作协	钟日胜	壮族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年12月	吴超莹	广西作协			
45	《面朝活水》	石彦伟	回族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1年12月	王军	中国文联出版社	钟日胜	壮族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年12月	吴超莹	广西作协			
46	《细雨绵绵》	德吉卓玛	蒙古族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8年8月	益春措姆	青海作协	金虎雄	朝鲜族	民族出版社	2009年8月	李明鹤	延边作协			
47	《谁为人类忏悔》	古岳	藏族	作家出版社	2008年5月	那松	青海作协	奚继善	满族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1年12月	张佑臣、赵国春	黑龙江作协			
48	《你的微笑》	张承志	回族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9月	戴发旺	北京作协	《成边之士》	蒙古族	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年4月	欧特红	西藏作协			
49	《二酉散简》	杨盛龙	土家族	学苑出版社	2011年7月	洪文雄	北京作协	贾合甫	哈萨克族	民族出版社	2010年3月	杰恩斯别克	新疆作协			
50	《站着说话》	何霖	布依族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1年8月	王军	广东作协	贾合甫	哈萨克族	民族出版社	2010年3月	杰恩斯别克	新疆作协			
51	《天河坪档案》	覃世清	土家族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	高毫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苏丹·江波拉托夫								
52	《碧绿的明冰》	孙玉民	赫哲族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0年1月	左灿丽	中国戏剧出版社	哈萨克族	民族出版社	2008年2月	2011年5月	阿里木江	新疆作协			
报告文学												艾合买提·伊明	新疆作协	哈萨克文	维吾尔文	
1	《汪海三十年》	赵晏彪	满族	人民出版社	2008年3月	孙涵、冯瑶	人民出版社	平措扎西	藏族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2011年5月	索朗次旦	西藏作协	藏文		
2	《七彩织锦》	黄玲	彝族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1年12月	张一龙	云南作协	鹿萨·罗布次仁	藏族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年6月	周秀春	西藏作协			
														董保存	总政宣传部艺术局	

## 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参评译者名单

（排序不分先后）

编号	译者	民族	评选年度内翻译作品名称	原文语种	翻译语种	推荐单位	6	龙冬	汉族	《仓央嘉措圣歌集》	藏文	汉文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	查刻勤	蒙古族	《阿尔泰诗选》	蒙古文	汉文	内蒙古作协	7	苏德新	汉族	《荒原记忆》	维吾尔文	汉文	新疆作协
2	伍·甘珠尔扎布	蒙古族	《毛泽东诗词》	汉文	蒙古文	内蒙古作协	8	次多、朗顿·罗布次仁	藏族	《绿松石》	藏文	汉文	西藏作协
3	赵文工	汉族	《鄂尔多斯史诗》	蒙古文	汉文	内蒙古作协	9	沈胜哲	朝鲜族	《不朽的英灵——崔采》	朝鲜文	汉文	延边作协
4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柯尔克孜族	《玛纳斯(第一部)》	柯尔克孜文	汉文	北京作协	10	格桑古堆	藏族	《家》	汉文	藏文	西藏作协
5	买买提沙力·买提肉孜	维吾尔族	《论语》	汉文	维吾尔文	民族出版社	11	夏米·尼扎米丁	维吾尔族	《回望人类发明之路》	汉文	维吾尔文	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